

李商隱評傳

楊柳



1207.203/6

李商隐评传

杨柳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7808

江苏人民出版社



837808

李商隐评传

杨柳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1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290,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册

书号：10100·506 定价：1.00元

责任编辑 张惠荣

前　　言

晚唐优秀抒情诗人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艺术成就较高，冯浩誉为晚唐诗坛之“巨擘”，要非无见。但由于他的诗写得隐晦曲折，“深情绵邈”（刘熙载），“隐词诡寄”（张采田），“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索解良难。元遗山有“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感慨，王渔洋也发出“一篇《锦瑟》解人难”的喟叹，从而长期来评价颇不一致，或者说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受到很多人赞赏，另一方面又遭到不少人非难，造成毁者过其实，誉者失其当的情况。从广泛意义说，对李商隐诗的研究，在文学史上尚处于探索阶段。解放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可以而且应该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突破，填补文学史上这一空白点，全面地深刻地探讨李商隐的生活道路和艺术实践，阐明他的诗的创作精神和思想艺术特征，给他的为人和创作作出客观的评价。应该说，这对于我们批判地吸收丰富多采的古典诗歌遗产，学习古代诗人创作经验，做到“古为今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新诗运动服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编写的体例上，我把对诗人行踪的考证探讨和对诗篇的分析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诗人生平活动中探索他的篇什的寓意，同时又通过对具体诗篇的剖析进一步了解他的踪迹。这是因为离开了诗、文创作，李商隐的一生是很平凡的，

而且史料少，将没有什么可写；反之，如果脱离了他的生平踪迹考证，由于他的诗善于“埋没意绪”（冯浩），“纡曲其旨，诞漫其词”（朱长孺），很难窥见深刻含义，求得确解。我以为，对于象李商隐这样一位具体诗人的评传，采用上述行踪考证钩稽与创作探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写还是较合适的。

本书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不少单位、同志的鼓励与支持，提出宝贵意见，谨表谢忱。

由于笔者思想业务水平限制，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学者和读者的批评指教。

杨柳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李商隐——晚唐优秀的抒情诗人	1
第二章 诗人的家世	16
一 没落的小贵族	16
二 关于诗人的兄弟姊妹行	20
三 诗人的出生年代考证	24
四 关于两个名称——玉谿生和樊南生	31
五 生平著作	34
第三章 不幸的童年	40
第四章 生活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44
一 艰苦的学习	44
二 开始创作活动	48
三 受知令狐楚	56
第五章 科 举	65
一 十年应举	65
二 甘露事变中的诗人	70
三 “学仙玉阳东”	77
四 中进士	90
第六章 婚 姻	94

一	追求	94
二	结婚	96
三	婚后生活	104
第七章 释褐入秘书省为校书郎		108
一	牛李党争和诗人	108
二	试博学宏词科不中选	123
三	由校书郎出为宏农尉	129
第八章 书判拔萃再入秘书省为正字		139
一	移家关中和江乡之游	139
二	重入秘书省	159
第九章 居母丧		166
一	由长安移家永乐	166
二	服阙复官	182
第十章 从桂管郑亚幕		192
一	赴岭外	192
二	创作上的丰收	201
三	淹留荆巴	206
第十一章 就徐州卢宏正幕		216
一	陈情	216
二	由周至尉到京兆留假参军	219
三	在徐州	230
第十二章 在梓州柳仲郢幕		237
一	陈情和悼亡	237

二 赴东川	246
三 在东川五年的生活和创作	251
第十三章 暮年生活	268
一 在长安	268
二 江东之游	277
三 病逝郑州	285
第十四章 李商隐诗的创作精神探索	293
第十五章 李商隐诗的思想内容	306
一 自伤生平的篇什	306
二 政治讽刺诗	319
三 艳情诗	334
四 写景咏物诗	353
第十六章 李商隐诗的艺术特征	358
一 缜密的构思	358
二 凝炼的语言	372
三 严密的律法	386
四 比兴和象征的表现手法	399
五 无题诗的创写	411
第十七章 李商隐诗的影响	422

第一章 李商隐——晚唐优秀的抒情诗人

“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

唐朝的诗，形成一代的文学潮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拥有诗人之盛，流传篇什之多，艺术造就之高，诚为历代所望尘莫及。宋计敏夫搜采唐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等而编成《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包括一千一百五十家作品。以后历代唐朝逸诗续有发现、增益。迨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编纂成的唐代诗人总集——《全唐诗》，已拥有九百卷的浩繁卷帙，共收入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包括各种体裁与形式的长短诗篇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全唐诗》还不是完备的集子，唐朝实际上出现的诗人和诗篇，决不止此数，而要远远超出今日流传下来的数字。①

①据敦煌石壁发现的唐人写本残卷，李昂诗三篇，《全唐诗》载一篇，而佚其二。王昌龄诗十七篇，见于集本者仅三篇。邱为诗六篇，陶翰诗三篇，今载于《全唐诗》者各一篇。（《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册，页3）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唐诗人有名不显者》条，《容斋续笔》，卷一，《唐人诗不传》条列举韦迢、郭受、李础、卢尉、元宗简诸人例子，说明唐诗人“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前贤遗稿，湮没非一，真可惜也”。宋去唐未远，尚如此，更无论其后矣。明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2中曾作过统计，得出结论是，宋南渡后，唐人集“已亡十之七八，今即一二间存，率好事钞集类书，非其旧也”。“唐人倡和寄赠，往往类集成编，然今传世绝少，以未经刊落，故尤难传远”。（《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页270—272）

明代的高棅（廷礼）编选《唐诗品汇》一书，根据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以及唐诗本身的发展规律，提出初、盛、中、晚四个划分唐诗时期，世称允当。就唐诗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总的倾向而论，初唐仅为开创期，这阶段虽也出现一些著名诗人如贞观、永徽之际的王、杨、卢、骆、刘希夷、上官仪；神龙以后的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其中象陈子昂还写出过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如《感遇》等。但总的说来，这时期诗人的艺术造诣和创作成就，是比不上以后几个阶段的。

盛唐可以说是唐诗的全盛期，一方面在诗歌的创作领域内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艺术流派，出现了不少具有鲜明风格的诗人，如以描绘自然景物见称的王维、孟浩然，以反映边塞生活擅长的高适、岑参；另一方面使唐诗的思想艺术水平达到一个极为辉煌的新的高峰，产生了大量成熟的作品，诞生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第一流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高棅在《唐诗品汇·序》中描述这时期情况说：“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中唐承盛唐之余绪，诗歌创作领域获得大丰收，涌现出不少有才华的诗人，如韦应物、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张籍、王建、白居易等，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尤以白居易成就为最大，他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又加以新的发展，杜诗苍劲雄浑，白诗平易近人，可谓学老杜能得其精神而不袭其面貌者也。

到了晚唐，论者谓唐诗已遭到厄运，进入死胡同。我以

为这种意见未见允当，值得商榷。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不仅受其本身特殊规律的制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客观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时代，孕育出不同的艺术流派。从唐诗发展的复杂过程和丰富内容看，晚唐非但不能简单地视为诗歌趋于没落或遭受厄运阶段，而且还应该肯定在某些方面是有着进一步的发展的，应予重视。这种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以优秀的抒情诗人李商隐为代表的新的诗歌流派的形成。这一流派的诗歌在艺术实践上独辟蹊径，创作方法上也作了新的探索，在唐诗发展过程中，也曾别开生面。时间是考验艺术创作价值高低的最好标尺，尽管唐代诗坛上出现过的诗人很多，但今天还活在人民心目中的大家、名家已属无几，正如计敏夫所指出的：“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余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①宋去唐未远，尚且如此，更遑论今日，离唐已千余载！而在今日还活在人民心目中的为数不多的唐诗人中，毫无疑问，李商隐是占有席地的。

历来评李商隐诗者，一方面赞叹其设采繁艳，吐韵铿锵，结体森严，旨趣遥深；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好积故事，隐僻、晦涩。这种赞美和非难应当说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问题不能在这里停止，必须作进一步探讨：李商隐这种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何在？它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又如何？在这一基础上进而全面深刻地阐明李商隐诗的创作精神和思想艺术特征；同时结合诗人的生活道路和艺术实践，对诗人本身及其作品作出客观的切合实际的评价。

叶燮（星期）在《原诗》中有一段话：“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词、意俱不

①《唐诗纪事·序》。

同，各有至处。至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①这里虽只就七绝发表评论，但却已简括扼要地揭示出李商隐诗的思想艺术特征。李商隐诗寓意深远，语言清丽，正所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②写得含蓄、蕴藉。阅读时给人以深思，以遐想，一种回味无穷，意在言外的美的感受；但有时也难免流于隐晦，曲折，恍如“高唐十二峰”，缥缈虚无，令人有朦胧含闪，捉摸不定的感觉，难怪元遗山要发出“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感慨，而王渔洋也不免产生“一篇《锦瑟》解人难”的喟叹。历来赞美义山诗者以此，而批评义山诗者也多半以此。诗人自己似乎也预见到后人会对他的诗投来这样的责难，在诗篇中一再自我表白：“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这不是明白地告诉读者，诗人写的诗篇都是有寓意、有寄托的吗？

就创作精神说，李商隐的诗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色。他的诗一方面吸取自《诗经》开始、中经汉魏南北朝乐府、下至唐朝杜甫的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从《楚辞》中汲取浪漫主义的有益养分。李商隐诗善用比、兴手法，这显然是受《诗经》的影响。义山诗“寄托深”的特点是和比兴手法的运用分不开的。过去不少评论家均指出李商隐善于学杜甫而且取得成就。^③当然，李商隐诗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和杜甫诗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读者喜爱商隐诗也正由于他具有这种独特风格，决不是因为他学

^①《原诗》，卷四，《外篇下》，《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册，页610。

^②刘勰：《文心雕龙》，卷下，《丽辞第三十五》，人民文学出版社，页588。

^③见本书第十四章《李商隐诗的创作精神探索》。

习杜甫而“得其藩篱”（蔡宽夫）或“得其仿佛”（叶少蕴）。但诗人在形成、发展自己的风格时曾从老杜的创作经验中吸收有益养分确是事实。在今日流传下来的诗人六百余首长短诗篇中，就有几首题目标明是拟杜工部的，如七律《杜工部蜀中离席》、五律《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这几首诗历代评论家认为确是运用“杜法”，“真是老杜语也”。诗集中也有不少深刻的现实主义诗篇，例如为人称道的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偶成转韵》、《戏题枢言草阁》、《咏怀寄秘阁归僚》等。

可是，还得看到李商隐诗的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奇文郁起”，“惊采绝艳”，^①想象丰富多采，论者谓其“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杨大年）。这方面又显然受到《楚辞》中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与哺育。义山诗集中以《楚宫》、《过楚宫》、《楚泽》等为题的竟有十来首之多；在具体诗篇中借用《楚辞》的典故或运用《楚辞》的词语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诸如襄王、宋玉、宓妃、巫山、高唐、阳台、楚厉、女萝、招魂、湘波等等词语，在诗篇中反复出现。

在创作精神上，李商隐还受到中唐“鬼才”^②诗人李贺的影响，也有意识地学习过李贺的创作技巧，在他的诗集中保存有一首《效长吉》诗。而李贺诗的创作就是继承《离骚》浪漫主义精神的。^③

①《文心雕龙》，卷上，《辨骚第五》，人民文学出版社，页45，248。

②《诗话总龟》载宋景文公评唐人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

③杜牧《李长吉歌诗·序》中说，贺诗“盖骚之苗裔”。

李商隐和盛唐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创作上关系怎样？历来殊少论及。实际上，李商隐十分重视李白而且也向李白诗学习，这和元稹诸人的先杜后李、尊杜抑李的观点有所不同。且看他的《漫成五章》之二中的诗句：“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不是把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吗？五代时韦縠编选唐人诗集——《才调集》，其卷六所收古律杂歌百首：李白二十八首、李商隐四十首、李涉十五首、唐彦谦十七首。编列次序首先是李白，其次即为李商隐，然后才是李涉、唐彦谦。笔者初以为偶然，不加深究。迨阅冯班（定远）评论，觉得大有意思。冯氏于李白题下加评语云：

此书多以一家压卷，此卷太白后又有李玉溪，此有微意，读者参之。

又在李商隐题下加评语云：

选玉溪次谪仙后，乃是重他，非以太白压之也。

这样看来，《才调集》的编者似乎有深刻用意，他很能理解李商隐和李白这两位相去百余年的诗人，在创作精神方面的某些内在联系。朱长孺谓：“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深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这论断是中肯的。

但是，长期来人们对李商隐诗的思想艺术评价未能取得一致。除了正确的评论外，也出现不当的甚或错误的意见。例如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评论到李义山创作：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就公然视李商隐为西昆派。李纯甫在《西岩集·序》中也说：“义山善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

殊无典雅深厚之气。”就这样把一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抒情诗人，归入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流派中去，他的优秀诗篇也被列入《香奁》、《疑雨》一类作品中去了。诗人也因诗的被误解而被视为“浪子”。^①这实在是莫大的冤屈，我们有加以辨析的必要，还李商隐的为人和他的诗以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评价。

西昆派是十一世纪亦即北宋初年出现于中国诗坛上的一个唯美主义的艺术流派，拥有作者颇众，对当时文坛所起影响也不小。他们自我标榜吹嘘：“雕章丽句，脍炙人口。”^②人们却批评为“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③西昆派的主要人物杨大年（亿）、钱惟演（文僖）、刘子仪（筠）特别喜爱李商隐诗。葛常之的《韵语阳秋》载：“杨文公（亿）在至道中得义山诗百余篇，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叶少蕴《石林诗话》也载：“国初钱文僖与杨大年、刘中山皆倾心师尊（义山），以为过老杜。”刘贡父《中山诗话》也称：“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窃义山语……子仪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刘左右贵重之如此。”他们也企图东施效颦，学写义山诗，试举钱惟演的《无题》：“误语成疑意已伤，春山低敛翠眉长；鄂君绣被朝犹掩，荀令薰炉冷自香。”形式上的确也多少学到了义山的一些皮毛。但是，李商隐诗和西昆派诗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艺术流派，不能相提并论。西昆诸子爱好义山诗，甚至挟义山以自重是一回事，义山诗本身的思想艺术成

^①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引石林评语云：“诗人论少陵忠君爱国，一饭不忘，而目义山为浪子。”

^②《西昆酬唱集》，杨亿写的《序》中语。

^③石介：《怪说》。

就及其深刻寓意又是另一回事，应该加以区别。过去有不少评论家也早已指出这点，朱少章说：

义山……别立门户，成一家；后人挹其余波，号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风月堂诗话》）

何义门也指出：

冯定远谓熟观义山诗，自见江西之病；余谓熟观义山诗，兼悟西昆之失。西昆只是雕饰字句，无论义山之高情远识，即文从字顺，犹有间也。（《读书记》）

这些意见都是精辟而正确的，力图把李商隐和西昆派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但是他们却没有更进一步从正面阐明李商隐诗的创作精神及其思想艺术成就，特别是对李商隐诗的隐晦曲折风格的形成原因，缺乏深刻细致的探索。

我们知道，风格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的统一，它往往反映出艺术家的精神面貌和创作个性，风格是艺术家艺术成熟的标志。一位作家或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和他本人的主观愿望、艺术兴趣、美学观点以及创作技巧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客观现实。李商隐诗隐僻风格特征形成也必须从这角度来获得阐释。

“徒嗟好章句，无力致前途。”这是喻凫《赠李商隐诗》中的诗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崔珏《哭李商隐诗》中的诗句。这是义山同时代诗人的评价。这些诗句确已概括出李商隐一生悲惨的遭遇和不幸的运命。

李商隐生活于中、晚唐，历经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六朝，大都是平庸之主，不是崇信方士，“饵金石之荐”，就是“游幸无常，昵比群小”；不是早夭，就是遇弑。唐帝国的命运正处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乐游原》)的阶段，李唐政权摇摇欲坠，统治阶级腐朽无能的本质彻底暴露。中央出现宦官专权，跋扈恣肆的局面。朝臣面对阉竖淫威，噤若寒蝉；皇帝有时也成了宦官争权夺利斗争中的牺牲品。

与此相应的是朝廷中形成派系集团的斗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牛李党争”。这场斗争从唐穆宗时开始，到唐宣宗时结束，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恰巧和李商隐的一生活动同始终。朝臣互结死党，阿同伐异，壁垒分明，不论是非，但论党局。文宗尝谓侍臣“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①而这种外廷的政治集团斗争，又和内廷宦官的派系倾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影响推动，互相勾结声援。

中央政权的腐朽又直接影响到地方局势的动荡。各地藩镇割据，经常拥兵作乱，或互相攻战残杀，掠夺兼并。这中间直接受害的当然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无能，又招致来边远民族的侵扰，回纥、吐蕃和南诏等民族，乘唐室空虚，一再入侵，烧杀掠夺，生灵涂炭，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这就是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晚唐社会的缩影，也就是诗人所面对着的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给予诗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非但影响到他的生活道路，而且也影响到他的艺术实践。李商隐热情敏感，秉性正直，爱憎分明。他对黑暗现实不能沉默，但客观环境又不允许他大声疾呼，慷慨陈辞，因此他就采取隐晦曲折、侧击旁敲的方式创作，或写景抒情，即事咏怀；或借古讽今，咏史寓慨；或“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②运用比兴、象征、讽喻、双关等手法，

①《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②《樊南文集》，卷四，《谢河东公和诗启》。